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說明

### Preparation of NSC Project Reports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4-048-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陳芳明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共同主持人：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計畫參與人員：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 一、中文摘要

發生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四年之間的台灣話文論戰，標誌著台灣新文學運動在殖民體制下發展過程中的一次文化陣痛。通過了這場綿延四年之久的話文論戰，日據時期的台灣作家終於覺悟到必須建立大眾文學與鄉土文學的觀念。大眾文學牽涉到創作語言的使，鄉土文學則關係到創作內容的建構；這雙軌式的思考，對三〇年代台灣文學的影響可謂至深且鉅。在這場論戰中，出身於台北市作家郭秋生（1904-1980），扮演了相當重要而積極的角色。但是，在歷來有關話文論戰的討論中，郭秋生往往受到忽視，以至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與意義也未能獲得彰顯。

本研究計劃在於通過對郭秋生在論戰中發表的文字，以及他的文學創作，來印證台灣話文論戰所代表的文化意義。由於新史料的發現，特別是一九三三年《台灣新民報》重見天日以後，整個論戰的過程已有較為清晰的面目。過去史家往往把論戰時間侷限在 1930-1932 之間，現在的史料顯示，論戰一直延伸到一九三四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之後。由於這項發現，台灣話文論戰的意義也相形擴大。郭秋生在這場論戰中堅持主張以台灣話來書寫文學，從而建立他所提倡的大眾文學。把這樣的主張放置在日本資本主義面臨危機的三〇年代歷史脈絡裡，究竟代表怎樣的文化意涵？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歷來有關話文論戰的討論，大多集中在台灣話提倡的意義上，似乎對於論戰本身所反映出來的批判精神，以及論戰中對殖民體制的現代性所採取的抗拒態度，並未有較為深刻的探

索。

郭秋生在台灣話文論戰中，一方面強調台灣社會的主體性，一方面則以文學創作來實踐其話文理論。在同時期的作家中，產量如郭秋生那樣豐富者並不多見，但是他所受到的研究卻是最少的。這項計劃企圖填補台灣文學研究長期遺留下來的缺口。

關鍵詞：台灣話文論戰、現代性、文化認同、大眾文學、鄉土文學

#### Abstract

Kuo Chiu-sheng(1904-1980) w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volved in the polemic over the use of Taiwanese language in literary creativity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during 1930-1940. In the course of polemic, Kuo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ese dialect for Taiwanese writers when faced with the hegemonic discourse of colonial culture. Among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somewhat inclined to employ Chinese Mandarin or Japanese in literary writing, Kuo insisted that Taiwanese language was the best vehicle for colonized writers to speak out for the subaltern. Kuo's idea about "mass literature" and "native literature" stimulated Taiwanese writers to further efforts in the pursui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inquire into Kuo's involvement in the polemic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literary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literary during 1930's.

**Keywords:** polemic on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odernity, cultural identity, mass literature, native literature.

## 二、緣由與目的

近三年來，本人的研究計劃集中在日據時期現代性與殖民地文學的辯證關係之上。現代性的議題之所以值得重視，乃在於它與殖民體制有極為密切的連繫。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與文學想像，往往面對殖民性（coloniality）與現代性（modernity）的雙重衝突。由於現代性的崛起，大多始自西方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因此，凡是賦予現代性有關「文明」與「進步」的意義，都不免帶有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的色彩。從知識論的觀點來看，所有涉及現代性的議題都難以擺脫西方白人的價值判斷與文化準則。

台灣社會對現代性的認識，無疑是通過日本的殖民經驗而間接獲得的。對於台灣人而言，現代性的到來不免是遲到的。也就是說，對於現代性背後所蘊藏的「進步」、「理性」、「文明」等等的意涵，台灣人的接觸遠遠落在歐洲與日本之後。這種時間落後（time-lag），使得台灣知識分子產生「急起直追」的焦慮。但是，殖民地作家面對的問題並非只是迎頭趕上殖民者的文化而已，他們還必須釐清現代性中所夾帶的殖民性，這個問題在三〇年代的台灣文學中一直是糾纏不清的思考。在許多小說作品中浮現的猶豫、困惑、混亂、彷徨，正是顯示現代性與殖民性之間的相剋相生為台灣作家帶來的連鎖效應。

日本殖民者的現代性接觸，顯然比台灣還要優先。但是，殖民者在島上從事現代化改造時，卻把這種優先性，轉化成為優越性。他們在傳播現代化論述時，把「進步文明」等同於日本文化，並以此來對照台灣社會的「落後」與「不文明」。因此，隨著現代化運動的展開，「日本文化就是進步文明」的觀念也在台灣社會蔓延擴張。凡是接受現代化改造的台灣人，自然而然在潛移默化中認同日本文化的優越性。這種強勢的文化論述，不能不改變他

們對於殖民者的態度。在他們的思考中，無可避免會產生「日本人是進步的，台灣人是落後的」這樣的觀念。一旦這種文化位階的落差形成之後，台灣人在面對日本文化時，便會產生自卑與自責感。文化認同的動搖，就在這種影響之下發生。

這種現代性的接觸，對於台灣作家最為敏感。他們清楚看見同世代的知識分子在現代化改造工程中，如何喪失自己的文化主體，從而也逐漸放棄自己的歷史記憶，甚至還進一步鄙夷自己的母語。新文學運動中的台灣作家，幾乎都已注意到這種文化主體危機的問題。在三〇年代日本資本主義日漸在島上擴張之際，台灣作家更加能警覺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都不斷認同日本人的文化價值觀念。台灣話文論戰的爆發，就在於尋找恰當的抗拒途徑，以避免偏頗的現代化論述在台灣知識分子的思考裡逐步膨脹。

對於現代性的反覆考察與檢討，為的是進一步釐清台灣作家在殖民體制下的發言位置。郭秋生的文學主張與文學創作，為這樣的歷史反省提供了很好的例證。通過對郭秋生的研究，當可辨識台灣作家在重建文化主體時的掙扎與苦心，並且也可發現他在思考上的侷限性與語言上的脆弱性。由此而能更進一步理解殖民地文學的建構所遭遇的矛盾與衝突。

## 三、結果與討論

郭秋生在台灣文學史上的登場，始於一九三一年話文論戰發生之初。他並非是第一位主張台灣話文者，不過由於他呼應黃石輝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終於使整個論戰開始擴大。雖然他支持黃石輝的「鄉土文學」的主張，郭秋生言論的重點反而是偏向於台灣話文的改造。他的見解，其實是在強調「大眾文學」。因此，整個論戰雖然延續四年之久，基本上是沿著「鄉土文學」與「大眾文學」這兩條路線進行反覆的討論。

歷來有關台灣話文論戰的研究，未曾注意到「鄉土文學」與「大眾文學」這兩種不同觀念的建構。事實上，這兩種文學觀念牽涉到作家的思想立場。「鄉土文學」

比較偏向文學內容的描寫，凡涉及台灣風土、人情、歷史、民俗等本土特色的題材，都可劃入鄉土文學的範圍之內。換言之，鄉土文學比較沒有涉及階級立場的問題，而是照顧到整個台灣人的感情。鄉土文學應該是屬於全民文學或是民族文學。只要能夠表達台灣人情感的文學，就是屬於鄉土文學的範疇。

大眾文學的觀念，就具有強烈的階級立場。也就是說，「大眾」在三〇年代有其特殊定義，它是指普羅（proletariat）大眾，或者是無產階級的勞動大眾。要寫出大眾能夠接受的文學作品，就必須注意到文學語言的使用。對郭秋生而言，他從左翼文學的觀點來強調，認為台灣作家若要創造出屬於台灣人的作品，就必須使用大眾普遍流通的語言。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才能夠理解郭秋生所堅持的台灣話文改造的主張。換言之，郭秋生的左翼立場在整個論戰中是非常鮮明的。這種文學觀念，與黃石輝提倡的「鄉土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很大的區隔。

郭秋生的台灣話文主張，事實上是知識分子企圖為下層階級（subaltern）發言。這是殖民地文學中重要的關鍵。因為，在整個殖民體制之下，接受教育越多、啟蒙越高的知識分子，往往會受到現代化論述的影響，從而對於日本文化的認同也就越呈傾斜。相形之下，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大眾，在知識論上受到偏頗的現代化論述之支配，可以說相對的減少。他們比較能夠保持台灣的本土性格。然而，這種本土性，卻不由教育程度較的勞動大眾彰顯出來。左翼作家郭秋生高舉台灣話文的旗幟，一方面固然是抗拒日本人所艷稱的進步現代性與文化優越性，另一方面則是在維護台灣人的文化信心，而以本土語言來對抗殖民語言，進一步使台灣社會的主體性能夠獲得確立。

尤有進者，郭秋生的台灣話文主張，便是希望透過大眾文學的建立，以達到對下層人民的啟蒙。同樣的，他堅持作家必須使用台灣話來書寫文學，也是希望透過大眾文學的建立，來維護作家的本土性。這種語文書寫的策略，為殖民地文學形塑了

強烈的批判精神。

然而，郭秋生並非沒有遭遇困難。因為，台灣話自來都具備了「有音無字」的缺陷。作家在這種困窘的情況下，就不能不嘗試去鑄造新字。在論戰中，郭秋生提出許多解決「新字問題」的方案，而這樣的方案也使台灣話文的改造衍生了許多新的問題。更嚴重的挑戰是，強勢的日文教育使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日益習慣日語思考。在此情況下，台灣話文的使用與流通便受到很大的限制。郭秋生的台灣話文主張，到了三〇年代末期，正是在大環境的侷限下日呈式微。

#### 四、計劃成果自評

郭秋生在台灣文學史上的能見度，仍然有待提升。他的話文改造主張可能並不是成功的，然而，對於文學史的討論並非在於評估他的成敗。從知識考掘學的角度來看，應該重新探討在強大的現代化論述之下，在不斷膨脹的日文教育環境之下，為什麼郭秋生提出台灣話文的主張？他的話文主張的理論充滿太多的弱點與缺陷，然而，將這種殘缺的文化理論置放在殖民地經驗的歷史脈絡中，代表的又是怎樣的意義？郭秋生文學的暗示，至今看來仍充滿批判的精神。

從目前挖掘的史料顯示，郭秋生參與三〇年代文學活動的範圍相當廣活，至少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新聞》、《南音》、《先發部隊》、《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都看到他發表的文字。特別是在《先發部隊》上，郭秋生還為其撰寫發刊詞與序詩。他與同時代的作家的互動關係為何？他的文學主張究竟獲得怎樣的回響？他的文學作品獲得怎樣的藝術成就？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去追求答案。

郭秋生的社會寫實主義理念，與三〇年代左翼文學的發展息息相關。這項研究既已從「大眾文學」角度切入，則它與「鄉土文學」的主張是具備何種辯證關係，當可繼續延伸去開發研究。

#### 五、參考文獻

宋宜靜，〈日治時期台灣鄉土文學論爭研究〉，日本岐阜聖經學園國際文化研究科修士論文，2000年2月。

李獻璋（章）作，林若嘉譯，〈臺灣鄉土話文運動〉，《臺灣文藝》，102，1986年9月。

洪儀真，〈三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左翼思想及其背景之比較〉，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張桂華，〈苦悶時代下的文學：一九三二年《南音》的文學訴求〉，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陳美妃，〈日據時期台灣漢語文學析論〉，三重：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

黃文車，〈黃石輝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廖祺正，〈三十年代台灣鄉土話文運動〉，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廖漢臣，〈臺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臺北文物》，3：3、4：1，1954年12月、1955年5月。

廖漢臣，〈臺灣文藝協會的回憶〉，《臺北文物》，3：2，1954年8月。

Francis Barker, Peter Hulme & Margaret Iversen, ed. *Colonial discourse/postcolonial theor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9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rry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88.

Walter D. Mignolo, "(Post) Occidentalism, (Post) Coloniality, and (Post) Subaltern Rationality," in Fawzia Afzal-Khan and Kalpana Seshadri-Crooks, ed. *The*